『我向总理说句话』征集网民建言六万

社会保障

医疗改革

简政放权

教育公平

本报[illegible]3[illegible]讯 记者[illegible]报道：把自己的建议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让自己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执笔人”，是很多网友的心愿。如果你参加了中国政府网联合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11家网络媒体联合开展的“我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你的建言就可能被写进举世瞩目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你入选了[illegible]将在明天揭晓。

2015年，网友的建言就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来源之一。由中国政府网联合人[illegible]、新[illegible]央视[illegible]国网、新浪网、腾[illegible]网[illegible]网站发起的“2015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我为政府工作献一策”活动共收到网民建言7.9万条，工作人员摘选了其中1426条有代表性的建议报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其中46条建[illegible]政府工作报告中得以直接体现。

从今年1月31日起，“我为政府工作献一策”的升级版——“我向总理说句话”征集活动展开，民众与政府通过互[illegible]纽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活动上线期间，各网站通过各自独立的系统平台汇总网民建言，将发表合理性意见、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建言汇总，经整理和提炼后报送有关领导或转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单位。截至3月1日，已书面报送领导《“我向总理说句话”网民建言精选》3期，共计598条建言，其中有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21条国际网友留言。

据介绍，活动上线以来得到了广大网民的热情参与，网民建言全面覆盖了18个建言领域。截至3月1日，共收到网民建言61905条。其中建言热度最高的领域包括社会保障（3776条）、医疗改革（3649条）、简政放权（3555条）、教育公平（3454条）。网友建言的集中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高度吻合。

建言这么踊跃，怎样建言更容易被采纳？很多网友想知道答案。中国政府网运行中心负责人提醒广大网友，表达清晰准确且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建议或诉求，更有可能被选中。该负责人介绍说，“我向总理说句话”也是中国政府网的常态化留言栏目，自2014年3月1日上线以来，共接收网民留言352982条。对于这条民意上传通道，网友经历了一个从新鲜试探到成熟建言的过程。今天，多数网民能够理性表达、诚恳发声。很多网友在建言中不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建议，还会附上背景调查、可行性分析、实施步骤等详细数据进行佐证。部分网民具备专业知识和背景，或有过相关领域调研和研究经历，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这次活动代表了政府广开言路、倾听民意的决心，也让我们看到了‘高手在民间’的智慧，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各项工作的改进。”中国政府网运行中心负责人评价说。

两会“部长通道”亮相

3月3日下午，主持人在“部长通道”边访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者韩洁 安蓓 白洁）“中央巡视为何要杀回马枪？”“多校划片能否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专车规范管理政策何时出台？”……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位于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俨然成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守候多时的媒体记者向途经此处入场的部长们抛出一个个热点问题。

3日下午，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亮相。14时，距离政协会议开幕还有一个小时，北大厅通道东侧早已聚集了闻风而来的几十名记者。临时搭起的发言台上密密麻麻摆满了话筒和录音笔，十几台摄像机高高架起、一字排开，摄影记者们各自寻找有利位置，文字记者或席地而坐，或见缝而立，等候部长们进场。

14时30分许，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经过“部长通道”，成为第一位被记者“拦住”的部长。当听到记者提问中央巡视组为何要杀“回马枪”时，他回应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2016年将更加重视解决群众身边、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加大督促力度，不断推出新措施。

不久前教育部提出推行“多校划片”，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有记者认出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他抛出这个问题。袁贵仁说，多校划片是各地在解决单校划片未满足周边家长需求中探索出来的办法，是目前解决义务教育学校资源不均衡的具体举措之一。他建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推出。

16时30分许，大会散场时，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被眼尖的记者“截下”，就何时出台专车规范管理相关政策回答记者的提问。

“出台的具体时间希望‘越快越好’。”“公布以后，专车将得到规范管理。这一点我比你们都着急。”面对尖锐的问题，杨传堂面带微笑，一一作答。

民有所呼，“会”有所应。自2007年起“部长通道”逐渐成为两会又一重要的“新闻出口”，越来越多的部长主动走到话筒前为媒体记者释疑解惑，成为两会越来越开放透明的标签。尽管部长回答问题的时间有限，但不少在场记者表示，很多部长的回答“含金量”很高。

据记者从两会新闻中心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部长通道”开放力度更大，预计会有更多的部长在这里发声。

财政部长咋想咋看

“春节哪里也没去，就在家看看全球金融市场走势，思考一些问题。这不，年后就到G20‘中国时间’，紧接着又进入两会‘晒国家账本’时间。”3月2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接受《经济日报》“金记者”采访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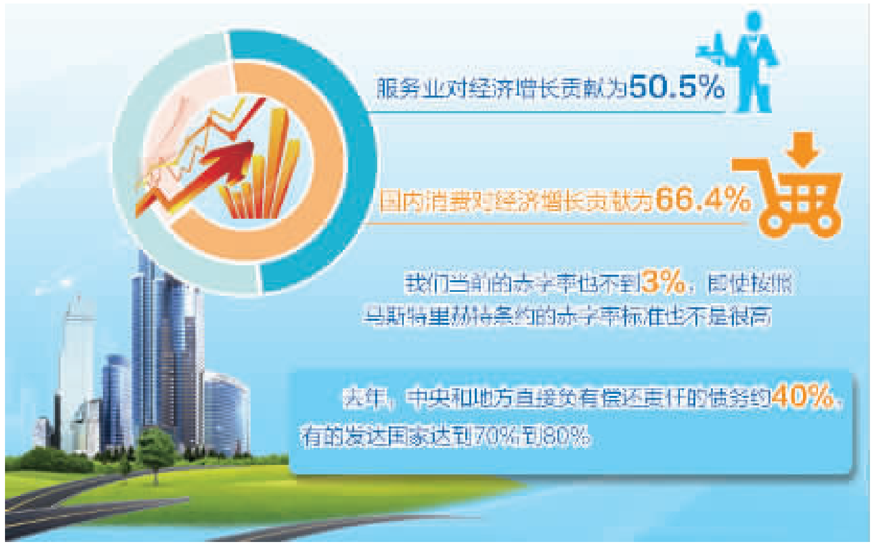
波动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前后，“新广场协议”被频繁炒作。“新广场协议”是子虚乌有的说法。”楼继伟笑称，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前几天也提到，当年“广场协议”签署的前提，一是全球经济面临较大危机，二是存在严重扭曲。现在G20没有面对较大危机，也不存在严重的扭曲，因此不具备签署的条件。

“近期的市场波动，并没有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这也是G20各国总体的看法。”楼继伟说，当然还须正视问题和风险，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波动、世界经济面临一些中长期挑战，需要考虑如何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

楼继伟形象地举例，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刚发生，大家站在悬崖边上，都积极同意改革；那么，如今就好比远离悬崖，不易形成改革共识，且现阶段各国经济复苏状况不同，如何使用政策工具、侧重点在哪，各国还存在分歧。以财政政策为例，有些国家主张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但有些国家反对，认为这只会掩盖经济风险，且没有充足的政策实施空间。而对于货币政策，大家在肯定其应对危机作用的同时，却在负利率政策的利弊上争论激烈。

“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认为QE是通过‘买时间’来进行结构性改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8年了，不少国家担心负利率环境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恶化，如果负利率政策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银行体系还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楼继伟说。



结构性改革成共识

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各国在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上达成一致。但是，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的两大成果建议“出炉”，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即构建结构性改革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建立结构性改革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

“结构性改革是要讲顺序的。”楼继伟说，见效快的措施先实施，比如提高行政效率。“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我邀请所有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到中国很多城市去看一看。那里的行政服务大厅普遍提高了行政服务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楼继伟说，过去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办不下来的事，现在几天、几周就办成了，极大地促进了创业、创新。但是，并非所有的改革都是既惠当前又利长远，不少改革短期会很“痛苦”，但长期将发挥很大作用，比如去产能。楼继伟说，像这样的改革就需要提前“拉单子”，早着手准备。

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对G20各方凝聚共识、树立典范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楼继伟印象深刻的是，在3年前的G20会议上，中方强调应深化结构性改革时，有的国家不予理会，有的国家则当场反驳，而今已成为各国共识。这与当前各国面临的中长期改革问题紧密有关，也与中国先行先试、创新实践带来的成效有关。

如今，中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为66.4%，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为50.5%，在适龄劳动人口逐步减少的情况下，这样的经济结构能够支撑中高速增长不易，未来更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

“目前，中国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和巨大的改革空间保障中高速增长。”楼继伟说，供给侧生产要素效率的改善、配置扭曲的解除、交易成本的下降，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在财政政策工具里，债务也有一定空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的赤字率标准并不是太客观，即使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当前的赤字率也不到3%，不是很高。”楼继伟说。

中国当期债务可控

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债务状况？会否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隐患？

“当期债务可控。”楼继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去年，中央和地方直接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接近40%，有的发达国家达到70%到80%。而对于政府或有债务，需要评估代偿率。“代偿率是不断变动的，经济好的时候隐性担保债务大部分都不会实现，但经济下行的时候，隐性担保债务实现可能性就比较大。因此，有的国际组织估计我国政府债务率略高于40%是可以理解的。”楼继伟表示，今年还将继续置换到期债务。因为预算法只允许省级政府发债，各省份到期债务规模都有统计，以省份为单位看我国政府债务是可控的。

“不过，要把政策空间用好，需要将短期就能见效和长期才能显效的措施搭配推进。”楼继伟说，在中国，现在很多措施已经见到成效。未来，除了实施简政放权、鼓励创新和投资的减税政策，还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义务教育资源的可携带，统筹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养老保险，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使得劳动力按照其适宜的配置要求流动。

楼继伟认为，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等举措短期可能是紧缩性的，但中期看，是扩张性的措施，必须推进。“我们的储蓄率还较高，必须要有投资而且是高质量的投资和创新性的投资。”楼继伟说。

请扫二维码看更多精彩

代表委员心声

杨敬农代表——

扶贫攻坚需建立清单

本报记者 白海星 崔文苑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要坚定不移地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地方党委、政府要全力以赴落实好中央的部署，坚定不移地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全国人大代表、安徽亳州市委书记杨敬农认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必须以精准识别为切入点，扎实做好致贫原因梳理、脱贫举措制定、脱贫时限明确、保障措施落实等一系列工作，“概括地说，扶贫攻坚要立足精准，建立清单。”杨敬农代表说。

杨敬农代表以亳州的实践举例说，扶贫攻坚首先要做到精准识别扶贫对象。2015年，亳州共派驻1260个工作组，对全市286个贫困村、974个非贫困村全面摸排，逐户逐人仔细甄别，摸清了底数，了解了户情。

其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扶贫清单”。按照“解剖麻雀”的手法，认真梳理研究扶贫对象需求及措施清单，立足村情、户情实际，为贫困村、贫困人口逐一精心编制个性化的精准脱贫扶贫对象及需求清单、脱贫时限清单、扶贫措施清单和脱贫责任人清单等“四项清单”，做到精准扶贫脱贫“一本清账”。

再次要创新扶贫载体。包括因地制宜探索光伏扶贫、创新小额信贷评级授信和金融扶贫模式，健全完善连接贫困户利益的分享机制、制定针对特色种养业的奖补政策等，充分调动贫困群众从事产业发展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多渠道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

最后要健全定点帮扶机制，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确保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每个村（含非贫困村）都有包村单位，每个贫困村都有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每个非贫困村都有驻村扶贫专职干部，织密了扶贫帮扶网。

上图 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曾蓉（中）在驻地接受采访。曾蓉委员今年的提案聚焦电商，建议加快在西部省份建立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这将对促进西部贫困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下图 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李宏塔（左一）外出参加座谈时，与来宾就“养老”和“扶贫攻坚”交流看法，为准备的提案收集资料。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李振生代表——

结对帮扶要注重实效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我今年带来的建议，仍然全部与扶贫有关。”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蓉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说。

上个世纪70年代，李振生代表创办了莱克石化，目前年产值达到了5亿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李振生代表到甘肃考察学习，发现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群众尚未摆脱贫困。

“要甩掉贫困村的帽子，必须把他们的思路激活，富了头脑，才能富起口袋。”在李振生代表看来，西部地区并不缺资源，也不缺劳动力，关键在于转变观念。

因此，李振生代表决定自掏腰包，把甘肃省北顺村和钟家岔村的外出打工青年请到蓉中村参加培训。经过培训和指导，村民们和创业带头人一起搞起了养殖业，仅2015年下半年，就帮助村民们销售了12000多头羊。

李振生代表说，看到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幸福感，自己的内心十分愉悦，“这比办企业赚钱更让我感到快乐”。

“当前，我国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要在2020年如期脱贫，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李振生代表建议，应该加快对创业致富带头人的培训，倡导和引领东部更多先进单位、个人帮扶、指导、带动西部贫困村，通过结对共建，在信息、资源、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给予贫困村更多帮助支持，在思想理念、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等方面给予贫困村更多的指导和帮扶。

不过，李振生代表也指出，当前，有些贫困地区把扶贫培训作为福利，甚至出现过“培训专业户”现象。

“我们正在打一场扶贫攻坚战，应该把每一分扶贫经费都用在刀刃上，精准发力，不能只管花钱，不管质量、不看实效。”李振生代表说。

徐晓兰委员——

“精准扶贫”要靠“精准科技”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精准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如何做到精准扶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建议，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提高扶贫精准度。

徐晓兰委员认为，目前我国在精准扶贫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贫困人口的识别不够精确，存在部分被认证的贫困人口未必真正贫困，而真正贫困的人口可能未被认证的现象；经济发达地区是扶贫物资和人力的主要提供方，我国却缺乏相应的监测和规划；在相关数据的动态跟踪上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则和手段，各地无法保持较高的监测频率；缺乏科学合理的扶贫管理体系，各地区的数据缺乏沟通和共享，同时对数据的应用不够深入，缺乏全面高效的数据分析和决策。

“造成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扶贫中的数据获取难、分析难和管理难。随着科学的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徐晓兰委员说。

为此，她建议：一是拓展贫困地区的数据获取维度，打通扶贫系统与国家其他系统的网络连接，将当地气象、工商、经信、农业、水利等相关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与扶贫相关的数据库接入扶贫信息管理，便于共享。二是加强对帮扶方发达地区可支出物资和人力资源的监控，除物资和人力的品种、质量和数量等外，其地理位置、交通成本等也要一并纳入网络监控。三是实现更高频率的数据跟踪和更新，使数据尽可能做到更新、更准、参考价值更大化。四是通过科研立项方式加强数据分析及应用，鼓励相关学者研究扶贫数据和模型，为贫困地区制定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五是构建大数据处理和云管理中心，将各地扶贫数据库、大数据模型、相关政策等通过网络连接，在顶层设立云端大数据处理中心。